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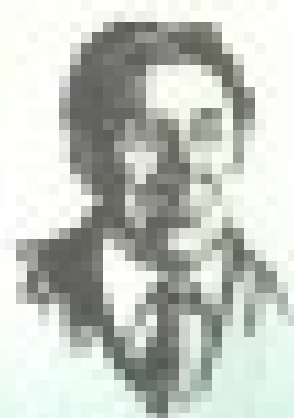


纽 伦 堡 审 讯

——随军采访四年④

〔苏〕鲍·波列伏依著

新华出版社



紐 倫 堡 電 訊

— 軍 民 同 舟 共 濟 —

1000

纽 伦 堡 审 讯

——随军采访四年

(四)

〔苏〕鲍·波列伏依 著
徐耀魁 姜励群 译
赵瑞联 赵瑞平

新 华 出 版 社

Полевой Б. Н.

Эти четыре года. Из записок военног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Изд. 2-е, доп.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78.

根据苏联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二版译出。

纽伦堡审讯

——随军采访四年

(四)

〔苏〕鲍·波列伏依 著

徐耀魁 姜励群 译
赵瑞联 赵瑞平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7,000字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600册

统一书号：7203·089 定价：1.10元

译 者 的 话

鲍里斯·波列伏依(1908—1981)是苏联当代著名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是从新闻界进入文坛的。他早期的著作大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对我国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颇具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列伏依作为《真理报》的军事记者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前线。他随军转战各地——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攻克柏林到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的审讯……本书所记录的，就是他这个战地记者在四年战争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读者从这部材料丰富的随军采访笔记中，不仅可以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某些详情细节，而且可以了解一个军事记者的战地生活和工作：他是怎样以记者的眼光去观察和记录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物的；他是怎样发现和搜集素材的，他又是怎样进行战地现场采访和及时发回通讯报道的……本书所记录的一切，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书中既有情节，又有形象；既写了作者的感受，又有人物的对话；既有战争残酷场面的描写，又有革命战士乐观主义精神的刻画。在本书所记录和描写的众多人物中，既有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高级指挥员，也有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普通一兵，还有全心全意支援前线的广大人民群众。读者不仅可以看

到德国侵略者烧杀抢掠、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可以看到他们为了效忠希特勒而无谓丧生、顽强作战的法西斯精神……

本书所收集和记录的素材，成了作者日后写小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象作者本人所说的，他后来写的一些著名小说，如《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黄金》、《大后方》、《维拉医生》、《我回来了》等，其主人公都是从这些战地笔记中脱胎而来的。我们在这部书里，可以看到这些主人公的原型及其主要事迹。如《真正的人》中的无脚飞行员；《我们是苏维埃人》中的女侦察员，《黄金》中的女打字员；《维拉医生》中的女大夫等。我国的文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以及对文学和新闻感兴趣的广大读者，都能从中受到启迪，学到某些有益的东西。

这部书原为波列伏依的战地笔记，后经作者修饰润色、整理出四部书，分别在苏联出版过单行本。这四本书是：《粉碎‘台风’计划》、《大进军》，《距柏林八百九十六公里》和《纽伦堡审讯》。一九七四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三十周年前夕，苏联近卫军出版社将这四本书分上下两册出版，书名为《这四年》。本书即根据该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第二版翻译的。中文译本拟分四册出版，每册包括原作的一部书。由于原书篇幅较长，描写过细，我们在翻译时删去了个别章节和词句，谨在此一并说明。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翻译的。全书译文最后由徐耀魁、姜励群同志校订。

一九八二，十，北京

目 录

弥天大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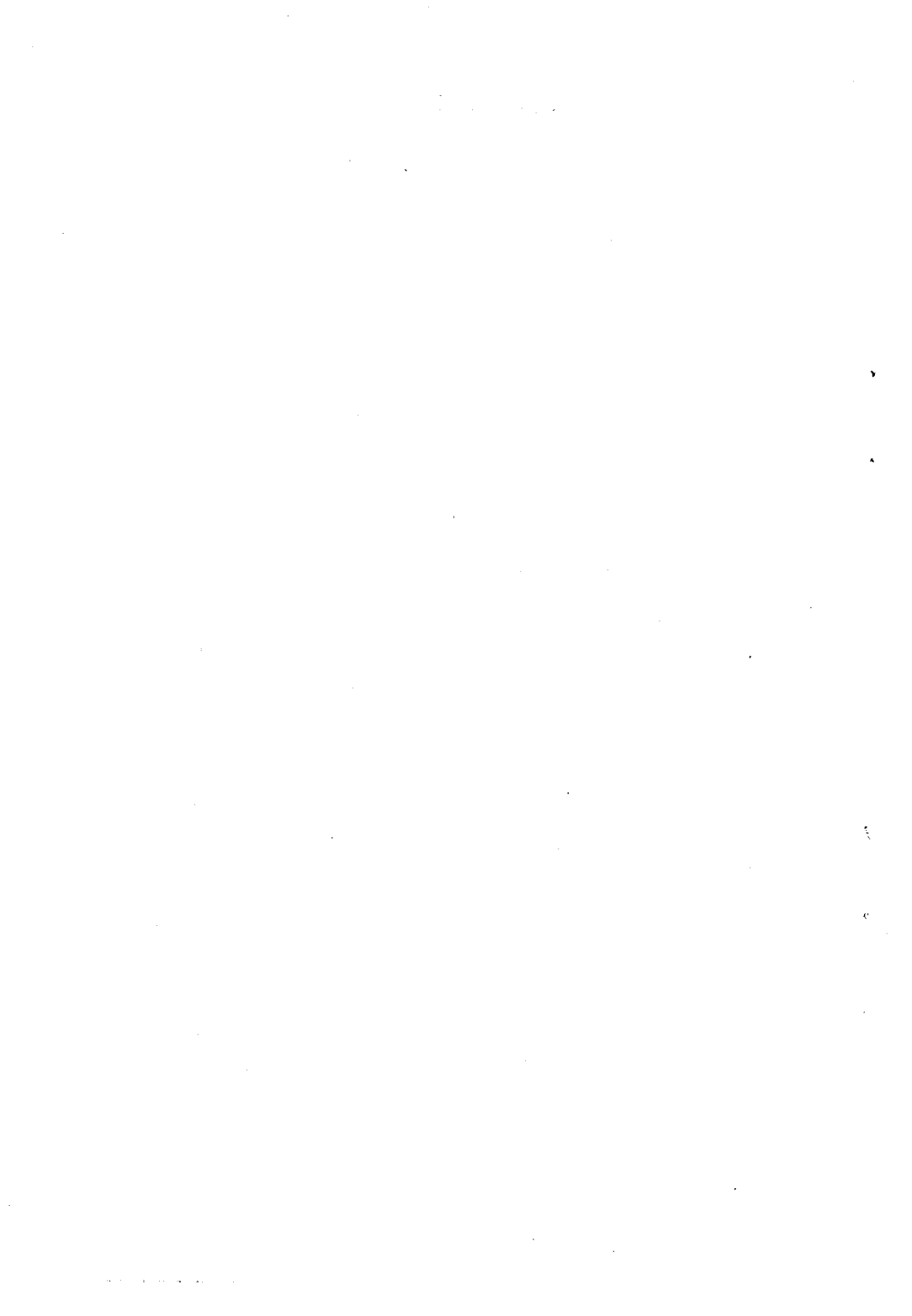
写书计划落空了	(3)
从莱比锡到纽伦堡	(8)
“文豪窝”与“丑角窝”	(13)
看不见的证人	(19)
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	(27)
一五八号房间	(30)
我们处在寝食不安之中	(38)
赫尔曼·戈林的活动范围	(43)
与康斯坦丁·费定一起回忆他的青年时代	(50)
“魔鬼的厨房”	(55)
圣·克拉乌斯的礼物	(59)
强盗的匕首	(62)

罪有应得

达豪的魔鬼	(69)
我们走进地狱	(76)

讲真话，只讲真话，绝不说谎	(82)
第六强国的使者	(88)
“巴尔巴罗斯”计划	(97)
讲坛上的死者	(101)
冰化雪消	(106)
敌人的黑话	(109)
真正的轰动	(113)
节日的祝贺	(121)
丘吉尔的演说	(126)
“第二号纳粹分子”在受审	(130)
英雄重踏征途	(139)
鳄鱼落泪	(142)
“摩尔达维亚贵族”的故事	(147)
雅罗斯拉夫·加兰的预测	(154)
士兵？机器？罪犯？	(160)
又是一场轰动	(165)
“夜与雾”	(167)
审讯超过半年之后	(174)
莫斯科纪行	(179)
重返纽伦堡	(187)
纳粹的最后一道防线	(189)
他们的最后发言	(195)
莫斯科点滴	(197)
尼密吉达拔出利剑	(202)
利剑血刃	(205)
行刑记	(208)

彌 天 大 罪



写书计划落空了

……我在世上活了几十个年头，但从未想过，在这个地球上，在欧洲的南边还住着一个不仅在语言、性格，甚至连生活习惯也都和我们俄国人十分相似的民族。早在青年时代，我就拜读过伊凡·瓦佐夫^①的作品，也曾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过报纸上登载的关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老巢——莱比锡与敌人交战的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时从报纸上刊登的简短的消息中，了解到保加利亚游击队在罗多彼山区和索非亚市开展地下斗争的情况。……但直至今日，我才有幸在保加利亚国土上好好地转一转，亲自到罗多彼山区看一看。在几个小镇、山村里住上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深深感受到两国人民的亲密友情。

一个多月来，我一直与司机维谢林在一起，驰骋在保加利亚各地。维谢林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保加利亚人。他有着一张线条分明、轮廓清楚的面孔。尽管我几乎一句保加利亚语都不懂，他对俄语也所知不多，但我们却能谈到一处。维谢林是共产党员，不久前曾是一名游击队员，在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中打过游击，所

① 伊凡·瓦佐夫(一八五〇——一九二一)，保加利亚名作家。——译者注

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他用点头来表示反对，而用摇头表示赞同，这和我们的习惯恰恰相反。

到友好的保加利亚访问，可算是编辑部对于我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头几个月紧张工作的一种奖励。最初，我计划乘坐汽车到保加利亚各地访问，目的是为我拟定中的一本书搜集素材。不过偶尔也为《真理报》写些随笔、特写。但这个动荡多变的时代不只一次使我的写书计划化为泡影。保加利亚正面临着大选。近几周来，大选前的斗争在这里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这使我再也无法保持旁观者的立场了。

“我们的选举，不是简单地选出国民议会的问题。这是选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要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这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前天接见我时说的。接见是在首都的一条僻静街头上的一所小房子里进行的。他象接待一位常客一样，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是在他的小小的餐室而不是在办公室里交谈的。（在我看来，在这所陈设朴素的小房子里不会设有什么办公室的。）餐桌上铺着一块粗布台罩，上面摆着酒坛和几个瓷杯。在一个小篮子里装着切成大片的灰面包，还有一种味美可口的家制熏鱼。不用说，我是睁大双眼望着主人的。因为从当共青团员的青年时代时起，我就十分佩服和敬重他。我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但季米特洛夫却很客气地把它从我手中拿过去，放在一旁，继续讲道：

“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选择，波列伏依同志！我们正面临一场复杂而紧张的斗争。”

他坐在藤椅上，象个刚从地里干完累活归来的农民那样，就着面包和奶酪，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带点酸味的红葡萄酒。

“在取得伟大的胜利以后，你们苏联人都变得非常乐观。当然，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我们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来讲，还

得打赢我国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役，而且还要一枪不发。”他把手中的瓷杯放在桌子上，接着又说：“不过，现在有的地方已开始放枪了……您知道吗，传说，如果共产党人获胜，美国人将用原子弹轰炸索非亚。当然，这是荒唐的无稽之谈，但传播这类谣言本身，就说明反动派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我有机会得以证实季米特洛夫的断言，而且这是通过我的亲身经历见证的。

格奥尔基·米哈依洛维奇赞同我写一本书，这本书要充分讲述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保苏友谊。他还建议我在大选的日子到普列文去看看……

我的笔记越记越多了。要写的那本书的提纲已在我脑海中形成，连书名也拟定出来了，叫做《兄弟》。我幻想着：大选一旦结束，我就从普列文发出一篇战斗性的报道，然后就在这里——我们友谊诞生的地方，马上开始写书。

但是，在一天早晨，一位保加利亚军官给我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当地卫戍区司令员从苏联大使馆收到的。电文是：“请您找到《真理报》工作人员、上校波列伏依，并协助他立即起程返回索非亚。”这是怎么回事呢？选举正在进行，为什么要立即返回呢？这里的斗争特别尖锐，所以许多外国记者都汇集到这个地方。这里已响过枪声，还有新的挑衅在酝酿之中。关于这一切，我应当写出报道。不过，我还是让司机去准备车子，自己则步行到各选区，最后再转一次。

看来，祖国阵线赢得最后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了。人们身穿节日盛装走上了街头，歌声不时从四面八方传来。在广场上，在教堂前，人们手拉着手，排成长行，在家庭式的小乐队的伴奏下跳起了欢快的民间舞蹈。

……是啊！我要从这里发出一篇很不错的报道，也可以取名为《兄弟》。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叫我回去，而且又那么急呢？

在旅馆的大厅里，服务员递给我一封电话电报：“召您回来的电报可收到？立刻动身。来后详谈。”署名是使馆一秘。这时维谢林张皇失措地跑到我跟前。原来，不知是哪个坏蛋将我们的“美尔西德斯”的四个轮胎都扎坏了，而且扎得很厉害，简直无法补救。……我又把新收到的电报给他看。他牙疼似地皱起了眉头。然后，象是想起了什么似地点了点头就离开了。其实，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类似的事情已有发生。就在昨天，在一个竞选大会上，不知是哪一家伙把苛性液体撒在我身上。虽然没有溅到脸上，但我的军服背面烧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大洞。军服坏了就坏了，这无关大局，出门时可以穿上军大衣；可是没有车子，怎么走？而且正当急需车的时候……

我窘迫地站在旅馆大厅中间，而我的西方同行们却一个接一个急急忙忙地奔向各自的汽车。和我同屋的一个肥胖的美国摄影师，此刻象一个萨满教巫师，脖子上挂铃铛似的挂满各种照相机，匆匆忙忙地跑在最后面，他边跑还边往嘴里塞肉饼；到了门口他朝我一挥手说：“回头见！”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刚在桌旁坐下，房门就无声地打开了，维谢林出现在我的面前，平时穿着整洁的维谢林现在成了什么样？！揉搓得不象样的帽子，歪戴在后脑勺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他手上沾满了油污，脸上却眉开眼笑。

“开路吧！”他用俄语说道。

不用他再重复，我们马上就起程了。原来，维谢林去找普列文的司机求援了。他们三十分钟内就将从别的车上卸下来的轮胎，装在我们这辆残车上了。这一切是谁出面组织的？又是谁付的钱

(看样子，这次修车花了不少钱)？这一切我一直不得而知。但最主要的是，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普列文，飞驰在通往索非亚的大路上……

维谢林将汽车一直开到大使馆的门前。值班员告诉我，大家已经找我好几天了。大使一见到我就责备开了：

“我的亲爱的，在这种时刻，您怎么不留下地址就远走高飞了呢？……莫斯科接二连三地往这里拍电报，可我们却不知道您去哪儿了。等着吧，您准要挨您上级的一顿骂！您看！”他一下递给我三份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阅后立即飞返莫斯科。任务火急，重大。加拉克季昂诺夫将军。”

“请告知，为何波列伏依尚未返回莫斯科？《真理报》常务书记西沃洛勃夫。”

“编委会决定任命您为参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讯的首席记者。手续已办好。坐第一班飞机返回。敬礼。主编波斯别洛夫。”

第一班飞机！不知大使馆哪一位用红铅笔在这几个字下面划了个红杠，还打了一个惊叹号。大使解释道：

“他们要我协助您及早起飞。但现在的天气不宜飞行。浓雾笼罩着整个机场。……或者，您坐火车走？”

我知道，大使想赶快打发我走，好向莫斯科交账。可我更清楚，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欧洲尚未恢复元气的时候，坐火车途经三个国家，将是什么样的滋味。不，不，如此“舒适安逸的”旅行，我可没有资格享受了。我们商定：一旦可以飞行，我就坐第一班航机，立即返回莫斯科。……

从莱比锡到纽伦堡

平时我有利用空暇时间写日记的习惯。战争时，为此不止一次受到同行们的嘲讽。但在今天，当“不宜飞行”的天气把我困在索非亚，当我为《真理报》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候，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今天我有幸又一次见到格·季米特洛夫，受益非浅。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于我将要面临的新问题的有趣的谈话。为了向他辞别，我请求他接见，他同意了。这一次，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见面。于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我怎么能穿着背上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的军服去呢？使馆的同志们帮了我的忙。与我同一军衔的一位武官把他的军服借给了我。可是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显得又肥又大。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办公室与在家里判若两人。在办公室里，他显得更高大，更威严。他的面孔看起来坚定、沉着、精神饱满，甚至显得更加年轻。不过，他的脸上还是流露出几分倦意，但握起手来，他还是那么紧紧的，显得特别有力。他指着小茶几旁的沙发，让我坐下，他自己坐在我对面，并递过一个水晶玻璃的烟缸，说道：“抽烟吧！这烟不错。是我们保加利亚的烟。依我看，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烟。”

我首先对祖国阵线取得的重大而光荣的胜利表示祝贺，然后向他提了几个关于普列文选举的问题。但他却马上转了话题。

“听说要派您到纽伦堡，去参加对主要战犯的国际审讯。这

就是说，您将审判我的老相识赫尔曼·戈林？有意思。希特勒德国这个‘第二号头目’坐在被告席上，将如何表演呢？”

“格奥尔基·米哈依洛维奇，在莱比锡，您曾是审讯戈林的第一名审判员。我还记得，我们共青团员曾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您的讲话文本，简直爱不释手。当您在法西斯巢穴舌战群凶，使戈林这头肥猪一败涂地时，我们都暗暗为您鼓掌叫好”……

“波列伏依同志，请您注意：这一次将是很不容易的审讯。莱比锡与纽伦堡不同。我还要劝您，尽早抛弃当团员时对敌人的那种老眼光。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虽然说，戈林的确是一头猪，然而，他并不愚蠢。您想想看，假如在莱比锡，我仅仅是凭借一根棍子就轻而易举地把这头蠢猪赶跑了的话，对我来讲，那绝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如果您把那些被审的人描绘成蠢猪、白痴，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一群疯狂的精神病患者，那您未必能揭示出红军及贵国人民战胜纳粹的全部伟大意义。”……

“纳粹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可怕的产物，”他继续讲道，“是的，最可怕的产物……但对于现代帝国主义来说，这可能又是最合理的产物，啊？希特勒曾幻想建立一个所谓全球性的纳粹帝国，使它至少能延续一千年。这不是某一个狂人的呓语，就是现在，这还是帝国主义者朝夕思慕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只要有会，他们就会把各国人民当成手中的牌一样，随意玩弄；把那些反抗者、抗议者，投进火葬场烧掉。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解决他们存在的许多尖锐的问题，诸如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心理问题等等……”

季米特洛夫讲一口流利、漂亮的俄语。而那种保加利亚人特有的口音使他的语言更显得优美动听。

“我一直在注视着审讯的筹备工作。我再重申一遍：这将是